

刊名创意：王蒙 刊名题写：沈鹏

本刊主编：姜锦铭

值班责编：李牧鸣



11  
韩松：科幻是中国社会变化的一面镜子



扫二维码，  
关注新华每日电讯

邮箱：worthreading01@163.com

电话：(010) 88051377

# 「蒸馒头者」金庸



▲10月31日，在香港的三联书店湾仔店，一位读者寻找金庸作品。当日，查良镛去世的第二天，香港许多书店都开设了专柜，陈列他的作品和相关书籍，悼念这名以笔名“金庸”写作多部武侠小说的著名作家。新华社记者李钢摄

是在1972年，距离今天也已经46年了。尽管他才刚刚辞世，但他的创作已经是大半个世纪前的事情。

他蒸的如果是十五屉馒头，那么这十五屉馒头已然被人津津有味地吃了大半个世纪，而且还在吃下去，罕有别家的馒头造就过如此盛况，这事如果发生在餐饮行业，那么各路晚辈美食家不应该恭恭敬敬地研究膜拜吗？

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，风云激荡，时局变迁，文艺的沙海中千淘万漉，人们的口味变化巨大。多少曾经喧嚣的声音都沉寂了，多少曾经璀璨的星辰都暗淡了，但金庸席卷华人世界直到今天，并且还会继续下去。面对这样壮观而独特的文学现象，后生小子是不是应该保持一点谦卑和尊敬？

回到文学的探讨中。什么叫“迎合了一群草根的英雄情结”？《水浒传》就是这样。什么叫“强烈的个人欲望与当下的无力感之间的剧烈冲突”？《红楼梦》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些充满心机的文字，不能成为否定文学价值的理由。

## 二

我以为，一个一流文学家的诞生，不管对于世界上任何民族而言，都是极为不容易的，好比沧海得珠，是值得该民族放鞭炮庆祝的幸事。

拿金庸来说，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他的出现？略一分析，我们也许会高呼万幸。他出生在中国大陆的浙江海宁，中国之“大”滋养了他。这个“大”包括辽阔的国土、众多的人民、悠久的历史、丰厚的文化。倘若他不是生在这个“大”国，他的作品也许不会是后来这样的格局。同时这个“大”还指大的时代，他在一个风雨飘摇、变化剧烈的大时代出生和成长，沧桑的时代造就文学家沧桑的心灵和笔触，这都是对他的滋养。

除了“大”，滋养他的还有“洋”。金庸的父亲是震旦大学的高材生，有早期的新派人士气象，他家要过圣诞节的，父亲给他送的圣诞礼物是狄更斯的作品《圣诞颂歌》。当时有几个孩子有这样的礼物呢？我到今天都没有读过《圣诞颂歌》。我家有一本，是出版社送的，包装精美，说起来惭愧到今天我都没有拆开过。

所以金庸不是一个完全土产的中国才子，而是一个洋才子，他自小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感染和熏陶，他的武侠小说之

所以具有强烈的现代性，也和这一点分不开。

后来，他幸运地被《大公报》派在香港，得以把写作的书桌安放在香港。像他此后开的栏目名“北望神州”一样，他得以在一个大时代中执笔北望神州，醉酒洒泪，沉吟感慨。而且在当时华人世界的其它角落都没有写作武侠小说的条件，香港却有。得天独厚的环境，才使他得以灵感奔涌，肆意挥洒和铺展才华。

他又碰巧当了多年的报人、记者。这份职业让他了解了更广阔的社会面，接触到更多的人群，对人性有更多的洞察。后来他小说中展现的世事洞明、人情练达许多都与此有关。他居然还做过电影导演和编剧，把戏剧中的种种手法都移植在了小说创作中。

他读的书，不少也不多——所谓“不少”，乃说已达到于搭建一个独立世界所需的基本元素的总量，而不致被普罗大众所看穿；所谓的“不多”，则是个相对的概念。就好比《倚天屠龙记》里，和杨逍相比，范遥和空智所会的武功就“不多”，事实上两人一个是“七十二绝技得其十一”，一个是“自负于天下武学无所不窥”，在绝对数量上仍然是多的。

“读书不多”在这里是个褒义词。如果金庸读书再多一点、知识再系统一点，甚至从小就经过经史典籍的严格训练，他或许能把那篇《袁崇焕评传》写得更好，但小说的精彩程度恐怕要大打折扣。扫地僧说的所谓“知见障”和“武学障”，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吧。

同理，他的诗词也不太好，做一流诗人是远不够的，但在小说里，却足以写出“盈盈红烛三生约，霍霍青霜万里行”和“红颜弹指老，刹那芳华”这样的回目词，足以应付出一个“桃花影落飞神剑”这样的美丽对联。

他的琴棋书画也不太好，聂卫平所谓“香港知名人士中国棋第一”的评语多半也是达不到的，但却已足够支撑他想象出“珍珑棋局”，写出苏星河、段延庆、鸠摩智这样风度各异的大棋士来。他也坦承自己的书法一般，专门做书家是远不够的，然而用来题武侠小说的封面，则又气象大不一样，例如“射雕英雄传”五字，题得颇有剑戟森严、长江大河的味儿。

他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的造物，是不同文化激烈碰撞的造物，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意识交融的造物，

是各种个人杰出的综合素质恰好拼凑齐全的造物。之前我说的这些条件，差了哪一个都不行，查良镛都不会变成后来的金庸。

他的小说里写过一个叫做黄裳的人，这人是一个图书管理员，前半生都在埋头读书，主要是读道家典籍，从来没有察觉过自己的使命。等到书越读越多，才猛然融会贯通，悟出了许多高深的武功来，发现自己的使命乃是武学，于是提笔著作，写出了一部《九阴真经》。

金庸其实就很像黄裳，整个前半生都在为命中注定的一个目标而蓄力，自己却茫然不觉。直至稀里糊涂万卷书读罢，猛然发现绝世武功已经上身，这才顿悟了上天的使命。作为报人的他才开始意识到：自己居然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小说家，并且是武侠小说家。从此，“九阴”出世间，江湖风云变。

所以，一个顶级文学家、一个传奇的诞生，是多么惊险，多么不容易。我们现在常常探讨怎么培养大师，其实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，是滋养出来的。我们该做的就是呵护水土，静静等待，除此无他。

## 三

对于金庸作品，我们很容易读“浅”。因为它的面目长得大不像经典。经典必须矜持、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不可作出取悦人、引诱人的媚态，但是武侠小说取悦人，甚至步步诱惑人深入。它们拥有大量读者，而大众的品位是需要警惕的，批评家们有理由这么认为。

在几十年前，金庸刚刚“登陆”的时候，我们的批评家是紧绷的、紧张的，文学同行们许多是抗拒的、逆反的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执着于一些条条框框的问题：金庸是“旧文学”还是“新文学”？金庸是“进步的”，还是腐朽的、麻痹人的？

我的读者告诉我，当时他们老师布置的任务就是要大家写作文批判金庸。在我的中学，有一位班主任查到学生读金庸武侠，便勒令其写检讨，宣誓和金庸一刀两断，并且要割破手指头，按血手印。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今天，是可以上头条的。

金庸写文调侃过台湾武侠作者的俗套，说必定是一个“丰神俊朗”的少年侠士，父母为仇家杀害；必定许许多多女侠都爱上了他，侠士一定中了什么迷药，和一个女侠“铸成大错”；这少年侠士一定

得到前代异人留赠的武功秘诀，遗书之中一定有“留赠有缘”四字，等等。话是不错，但其实他自己也无法完全避免俗套，甚至许多“俗套”还是他首创。比如跳崖总也不死，张无忌、段誉就都跳过崖，并且捡到了秘笈。

想要在这种“俗套”中造就经典，铸成丰碑，相当不容易，很考验查良镛。

他的小说最初的主旨，不外是所谓“演任侠好义，总群爱国之旨”。最早的《书剑恩仇录》，就是一个丰神俊朗、书剑如仙的少年侠士，立志驱逐鞑虏做好汉。当然，这部书里能看出来这作者野心极大，书写的地域十分辽阔，从江南直到回疆，从钱塘潮写到大漠风沙，人物也是庞杂众多，连民间故事里的阿凡提都跑出来了。光是红花会当家一写便是十四个，也不怕吃力。和后来的作品比，这部书明显稚嫩，刻画人物像是先勾了墨线，再郑重涂上水彩，仍然是二维的。直到了第三部《射雕英雄传》，金庸小说境界遂大，感慨遂深，黄蓉、郭靖、黄药师、周伯通等这一批人物壮丽登场，这才有了夏济安的感叹：真命天子已经出现。

而到1961年，金庸写出了所谓“射雕三部曲”时，他已经不知不觉间完成了一些非凡的事情。

看一个文学创作者的高度，有时候可以看他多大程度上融入了民族的血脉。比如只要听到一句“床前明月光”，但凡会说汉语的华人大概多半能顺口答出“疑是地上霜”，这就叫融入了民族的血脉。又比如今天读过《红楼梦》的仍然是少数，但只要说一个女孩像林黛玉，一个男孩子像贾宝玉，国人便会自然明白，不需要任何注释。

金庸不知不觉做到了这一点。哪怕一个人从来不看他的书和影视剧，也可能用到“华山论剑”“左右互搏”这样的成语。形容一个女孩子像黄蓉，国人多半会自然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不需要任何注释。而假如说一个阿姨像灭绝师太，她哪怕没看过金庸，也多半便要大怒。对于一个作家而言，这是极大的殊荣，是足以让人顶礼的成就。他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的基因，和我们的文化血脉一起流淌。

然而金庸在还写出了另外三部，所谓“三杰作”，就是《天龙八部》《笑傲江湖》《鹿鼎记》。

## 四

这里说一下《笑傲江湖》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一首诗，曾经在国内外非常流行，就是：

生命可宝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

其实这一首诗，真的可以拿来当金庸《笑傲江湖》的主题诗。它的主人公——令狐冲，就恰恰遇到了诗歌里的困惑：“要爱情，还是要自由？”

在书上有这样一个情节：令狐冲希望和任大小姐在一起，得成眷属，但老丈人任我行的条件很明确：必须加入日月神教。为了爱情，牺牲自由，行不行？令狐冲的最终决定是不行。

因为“圣教主千秋万载，一统江湖”的话，他说不出口。天天跪拜磕头连心拍马，他做不到。他说：“她（任盈盈）如真要我加盟日月神教，我原非顺她之意不可……可是要我学这些人，岂不是枉为人？”“甚么中兴圣教，泽被苍生，甚么文成武德，仁义英明”，男子汉大丈夫整日价说这些无耻的言语，当真玷污了英雄豪杰的清白。”

令狐冲就是“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”的典型。

令狐冲曾经有过一个回答不了的问题。那一次，在恒山悬空寺，少林方丈问令狐冲：为什么左冷禅（野心家）恨你？令狐冲说：因为晚辈总是阻挠他的大计。方丈追问：你为什么总要阻挠他的大计？令狐冲呆住了，他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。用书上的话来说就是：令狐冲一呆，一时难以回答，顺口重

复了一句：“我为什么要阻挠他的大计？”

左冷禅的“大计”，乃是要合并分散的五岳剑派，统而御之。这听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对。何况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，“合并”往往代表着正确的潮流，代表着积极和进步；而“分散”则往往代表着倒退、混乱、破坏和无秩序。那么令狐冲为什么要破坏左冷禅的大计？

写书到此时，金庸虽然也不过才四十四五岁，年方壮盛，但已然进入了他的创作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。《笑傲江湖》已经是他的倒数第二部书，他对武侠主题的探索和开拓已经到了更深远、微妙的地步。

之前他的那些主人公，不管是义薄云天的郭靖，冷傲偏激的杨过，还是优柔寡断的张无忌、豪迈过人的乔峰，都有着明确的人生使命，做事情都有着充分的理由，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奋斗。

例如郭靖就曾当面明确回答过忽必烈的疑问：郭叔父为什么死守襄阳？答案是“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”。他说“郭某一腔热血，是为神州千万百姓而洒。”而换了爱情至上的杨过，他又是因为什么而抗争呢？乃是为了和姑姑在一起。

可等到了令狐冲唱主角时，此公居然糊里糊涂，似乎全然不知自己为什么而奋斗。面对方丈大师的问题，他思索了半天，最后回答的大意是：左盟主让我感觉不好。我就是反感他。

事实上，令狐冲说不出的答案恰恰就在书名里，为了“笑傲江湖”。注意，“笑傲”的意思不是制霸，而是潇洒如意、随心所欲。如同这个词的渊源之一《西游记》中一首词所说，渔夫打了鱼，“得来烹煮味偏淡，笑傲江湖打哄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令狐冲本能厌恶左冷禅，反对他的“大计”，乃是他目睹左冷禅之流的种种手段，已然察觉到了这种“大计”的代价，那就是人人被压抑和屈从，个性不能舒展，不能“笑傲江湖”。

他曾有言：“我不愿做的事，便是师父、师娘、五岳盟主、皇帝老子，谁也无法勉强。”令狐冲所捍卫的，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状态。

至少到了这个时候，用金庸的博士生卢敦基先生的话说，金庸的笔已然从“民族性和阶级性中突围”，直接探索和叩问人性。他抬脚迈过了一道门槛，向着文学更终极的目的挺进。

## 五

人类有很多共通的幸事，让我们欣慰快乐。

比如赶上和平年代，没有遭遇战争；赶上富足光景，没有饥饿；比如春暖花开；比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；比如晴空一鹤排云上……而在这众多幸事中还有一种，就是和大师同时代。

就我自己来说，当然是无缘与屈宋同时代，就算把我发配穿越回去，以我的古汉语水平也无法和人家交流；无缘与李杜同时代，只能在他们的诗篇里遐想其风采；无缘和苏轼同时代，只能在他横溢的才华中钦敬；无缘和曹雪芹同时代，连他长什么样子，到底是不是一个传说中的胖子也不知道。但我和金庸同时代，在人类数以千年的漫长而悠久的文明史中，有那么短暂的几十年交集，我感到幸运。

我羡慕唐朝的魏万，他喜欢李白就可以跑去看看，还把李白的诗文稿子抱了回来。我没有见到金庸，好在当下这个时代有报纸广播电视，我可以知道他的生平，了解他的相貌，听到他的声音，这是一种庆幸。我们应当珍惜这一奇和才，大师同时代的庆幸。并且，还要感谢金庸一生足够精彩、圆满，感谢他享寿长久，才能让我们能以一种更平静、更释然的心态面对别离。

者，当时宿舍是茅草房，教室是夯土墙，吃的是糙米。由于经常吃不饱，他们成立了稀饭伙食团，合伙煮热粥，还有同学到外面兼职赚钱。

作为学生们的榜样，则是那些甘于清贫，坚持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教授先生们。“若非身临其境，谁能想象出西南联大的高级知识分子在那个时期的形象？”周锦荪清晰地记得，化学系的曾昭抡教授冬天时穿一件单布长衫，在新校舍北区来回跑步驱寒，嘴里喃喃有声，像是颤抖，又像是在喘息；文学系的朱自清先生经常像赶马人似的披一件白毛毡，领口用带子系得严严实实，当雨衣，又当外套，可是他走得那么从容而安详；心理学教授潘光旦先生总是穿一身黑皮衣裤，已经磨得发亮发白，四季不变；至于闻一多先生，以在中学兼课和自己刻字治印为生，大家都很尊敬他！

校友郑临川已于15年前去世，他的女儿郑慧珍和女婿李润今年代表老人来到西南联大旧址。（下转10版）

# 联大校友重返昆明，再忆弦歌不辍

本报记者白靖利、许万虎、宇强

从《西南联大》文库首发到西南联大博物馆开馆，再到《西南联大口述史》面世……连日来，云南师范大学异常热闹。庆祝西南联大在昆建校暨云南师范大学建校80周年的活动异彩纷呈。97岁的翻译家许渊冲、94岁的两院院士郑哲敏、91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奎——多名西南联大校友回到了几十年前他们筮吹弦诵的昆明，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出席大会的一些校友还专门发回视频表达祝贺。

去年，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。这所仅仅办学八年多的大学，为何引得世人如此关注？

## 三校入滇 铸就高等教育史丰碑

“烽烟万里踏征程，桢干移枝到春城；茅草为顶遮雨露，土泥作室听书声；

笛吹弦诵依前彦，继晷焚膏望后生；八十周年逢盛世，同圆两梦万年轻。”103岁高龄的西南联大大学1941级校友马识途这首贺词，简短而有力地概括了80年前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的风雨历程。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为保存中华文化与教育命脉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迁至湖南长沙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。后因战火逼近长沙，1938年4月，再迁至昆明，改称西南联合大学。

在昆明办学8年多，这所“战时大学”秉持刚毅坚卓的校训，在艰苦的环境中培养了大批人才，不仅为中国文化教育保存的“火种”，还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座精神丰碑。

形、金岳霖，中文系的闻一多、朱自清、沈从文，历史系的陈寅恪、钱穆、吴晗，外文系的吴宓、冯至、钱钟书，数学系的杨武之、华罗庚、陈省身等为代表，几乎汇集了中国各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和最高水准的教授队伍。

云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饶卫骅傲地说：“从西南联大走出了8位‘两弹一星’功勋科学家，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，2位诺贝尔奖得主，170多位院士等大批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才，我们为西南联大感到无比自豪！”

在烽火连天，国难当头的时代背景下，一大批充满家国情怀的师生坚定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滚滚热流中。据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统计，抗战期

间，西南联大学生中有1100余人报名参军，其中镌刻在联大纪念碑上的有834人，许多人牺牲在了抗日的战场上。

“学校按教育规律建立了先进的教学制度，严格的教学要求，学生则以抗日救国之勤奋学习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！同学们提出，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，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！八年间同学们有三次参军高潮，共达1100余人。”西南联大机械系1944级校友、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奎激动地说。

“千秋耻，终当雪；中兴业，须人杰。便一成三户，壮怀难折。”西南联大校歌这几句歌词，概括表达了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情怀和抱负。

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所作《缅怀西南联合大学》中写道：“卢沟变后始

南迁，三校联育共八年。饮水曲肱成学业，盖茅筑室作经筵。熊熊火炬穷阴夜，耿耿银河晓曙天。此是光辉史一页，应叫青史有专篇。”

## 刚毅坚卓 师生“动心忍性希前哲”

1940年考入西南联大的周锦荪已是白发苍苍，语言迟缓，但精神矍铄，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青年时期在西南联大求学的艰苦岁月。

“当时很多同学没钱，只够维持一日两餐，便靠在外兼职搞点收入，但更多的同学为了珍惜学习时间，忍受最低水准的生活而毫不动摇。”周锦荪告诉记者